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印度與東協國家的交往：歷史、現狀與問題

The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Legacie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Issues

doi:10.30402/EAS.201807\_49(1).0003

東亞研究, 49(1), 2018

East Asia Studies, 49(1), 2018

作者/Author：劉奇峯(Roger C. Liu)

頁數/Page：63-10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8/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07\\_49\(1\).0003](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07_49(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印度與東協國家的交往：歷史、現狀與問題

**The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Legacie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Issues**

印度浦那 FLAME（富來明）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劉奇峯

Roger C.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FLAME University)

## The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Legacie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Issues

Roger C.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FLAME University)

---

### Abstract

The year 2017 mark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dia-ASEAN Dialogue Partnership as well as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How has the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developed in the past years?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a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In the first level,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used to trace the India-ASEAN relationship since the Cold War period. In the second level, their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bilateral patterns of interactions is analyzed by quantitative methods with open data. In the third level, I discuss several essential aspects of India's policy towards ASEAN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India's "Look/Act East Policy" beginning in 1991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years especially on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with ASEAN countries. Howev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issues begin to emerge. First, India's "Act East Policy" still relies on specific count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tends to lag behind the schedul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cond, India'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omestic politics, at th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levels,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security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oth will inevitably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Keywords:** Act East Policy, India, ASEAN, Indian Diplomacy, Indian Politics

劉奇峯

印度浦那FLAME（富來明）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

### 摘 要

2017年是印度和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25週年，也是雙方建立高峰會夥伴關係15週年以及戰略伙伴關係建立5週年。本文以三個層次呈現印度和東協的關係發展。在第一部分以歷史方法追溯了自冷戰時期以來印度和東南亞國家及東協的交往，在第二部分以公開數據分析了印度「東進政策」下印度和不同東南亞國家雙邊關係的結構，而在第三部分則以相對微觀的角度，探討了印度對東協政策的幾個面向，同時分析了執行上的相關問題。印度在1991年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而實行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以及莫迪時代更名的「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多年來在雙邊和多邊的制度建構上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但在交往廿多年後，種種問題也開始浮現。首先，印度的東進政策在結構上仍然太過倚重特定國家，東進政策的執行也往往落後時程，這一點在面對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的時候更顯迫切。印度的政治文化在多邊和雙邊層面，給印度和東協的聯通性合作、安全事務的整合，以及經貿關係的進一步深化都帶來了影響。這也將為印度及東協接下來的整合，帶來無可避免的挑戰。

關鍵詞：東進政策、印度、東南亞國協、印度外交、印度政治

## 壹、前言<sup>1</sup>

2018年1月26日，受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之邀，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東協）十個會員國的領袖以年度貴賓的身分，出席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君主大道（Rajpath）上舉行的共和日閱兵大典（Republic Day Parade）。這是印度史上共和日首次有十個國家的元首出席。印度每年的共和日獲邀貴賓的所屬國，往往是當年印度外交政策方向的重點指標，例如2014年的日本、2015年的美國，以及2016年的法國，都在這幾年和印度加強了政治、經濟和安全的實質合作。由於東協是莫迪「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的核心地區，同時2017年又是印度和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25週年、高峰會夥伴關係15週年以及戰略伙伴關係5週年，故其政策寓意不言可喻。但在閱兵式舉行前夕，印度前任外交秘書（Foreign Secretary，相當於外交部常務次長）Shyam Saran卻在《印度斯坦時報》上投書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印度—東協的關係並未達成期望。在擴大交往的同時，（雙邊關係的）不對稱仍持續存在著。」（Saran 2018）。

在印度和東協於1992年建立對話夥伴關係、並以「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名義開展交往以來，到總理莫迪上任後將其更名為「東進政策」，在這近卅年的時間內，印度和東協的關係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展現在那些領域？又分別造成了什麼影響？

專門探討印度和東南亞關係的論文並不多。其他關於印度和東協國家的討論則在另外的題目下進行，特別在對「東望」或「東進」政策的討論中（方天賜 2001, 81-96；張棋焯 2016, 67-102）。東南亞對印度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在於它做為「東望政策」的起始

---

1. 作者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論人對本文所給予的寶貴方向與建議。

地和中心地位、它在印度「東望政策」初始以及之後在經貿投資等事務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也在於印度在大國之間進行外交時的戰略考量，特別是在衡量與中國的關係時，東南亞對印度來說成爲一個重要的戰略競爭或是平衡場域。在分析的層次上，多數研究採取了國際層級加上國家層次的分析，著重外在國際結構改變（特別是冷戰結束、蘇聯崩解及中國的崛起）對印度產生的作用，也將印度在國家層面視作單一理性行為者（unitary rational actor），探討印度在不同架構做出的反應，並嘗試對印度與東南亞的交往，在國際一國家層面作出解釋（explanation）或詮釋（interpretation）。印度和東協以及各別東南亞國家在經濟合作、貿易發展、安全事務或多邊關係上所簽署或達成的協定和成果，也被引述、整理和條列出來，以說明印度和東協國家交往深化的程度（蔡東杰 2007, 3-24；林侑靜 2016a, 83-118；林侑靜 2016b, 3-44）。

本研究認爲，在「東望政策」實行近卅年後，除了在國際和國家層面解釋印度爲何對東南亞國家擴大交往之外，有必要對其進行評估性檢討；而在描述並解釋雙邊合作的領域及深化程度之外，檢視印度和東協之間政策執行以及雙邊和多邊架構運行的成效亦有必要。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在東南亞的推進，印度也對東協國家開展了相對應的「聯通性」（connectivity）合作，而這也是新的、先前研究並未著墨太多的課題。

故此，本論文分成三個部分來檢視和探討印度和東協國家的關係。第一部分以印度的角度整理、敘述並分析自1991年來，在不同總理和政府之下與東南亞的交往和互動。在第二部分，本研究以描述性量化方法及自擬指標，分析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之下，印度和東協各國交往的程度和模式，並嘗試提出解釋。在第三部分，本文列出「東進政策」近年來發展中幾個比較重要的領域及問題，並加以探討。

在資料的運用方面，第一部分使用了近年來出版的總理傳記或回憶錄，希望能呈現和以往研究不同的印方角度。在第二部分，使用Google的GDELT數據庫來呈現印度和東協國家的雙邊互動。第三部分則運用較新的出版品及資料，來探討諸如聯通性等新議題。作者在不同會議或互動場合中與印方學者或是相關國家外交官員的談話，也被運用來支持本研究的論點。

## 貳、印度與東南亞關係的建構：冷戰時期到「東進政策」

不同層次的結構性因素，構成印度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接觸的背景。從國際結構的層面上來說，隨著蘇聯解體而來的兩極體系的崩解，為印度及東南亞國家的進一步交往解除了限制。印度和東南亞雖然在歷史和文化上有著悠久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在冷戰的時候，並未轉化成政治上持續交往的動力。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倡導「不結盟政策」及亞洲團結（Asian unity），曾主辦亞洲關係會議（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簡稱：ARC），也曾獨排眾議，邀請中國參加萬隆會議，並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Panchsheel）。新德里與印尼、緬甸、越南（北）等國一度維持著良好關係。不過，在東南亞國協（ASEAN）於1967年成立後，印度將其視為美國的附庸軍事同盟組織，如同尼赫魯時期反對的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CENTO）以及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SEATO）一般，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開始漸行漸遠（Kaul 2016, 5）。

1971年8月，新德里和莫斯科簽訂《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India-Soviet Treaty of Peac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偏離了其向來標榜的不結盟政策。印蘇之間的關係更隨著同年年末爆發的孟加拉獨立戰爭（即第二次印巴戰爭）而更加緊密。一直到1970年

代末期，印度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等事件上，堅定支持莫斯科的立場，也持續阻礙了印度和東協國家的進一步交往（Kaul 2016, 5）。

印度和越南的緊密關係造成東協國家的疑懼。1978年，在東協國家一面倒的譴責聲中，越南入侵柬埔寨，並在該國扶植橫山林（Heng Samrin）政權，但河內的行動卻得到印度的支持。<sup>2</sup>在美蘇對抗的結構下，印度於1980年代嘗試將海軍現代化的舉動，也引起東南亞國家及澳大利亞的注意，認為印度的政策不但會破壞區域平衡，也顯示出印度欲主導該區域的霸權心態（Acharya 2017, 50）。

而在國家層面上，1962年中印戰爭的結果，頓挫了尼赫魯信仰的、聯合亞洲國家對抗西方列強的「泛亞主義」（Pan-Asianism）；而分別在1965年及1971年發生的第一次及第二次印巴戰爭、以及尼泊爾倒向中國，和1983年的斯里蘭卡內戰等事件，也使印度將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重點轉向自身及南亞周邊，無暇顧及東南亞地區（Tremblay and Kapur 2017, 89）。印度雖然在1987年就以東協和越南之間的外交調人身分，恢復和東協之間的接觸，但雙方關係的全面發展，仍要等到冷戰結束後才開始。

### 一、與東南亞交往的第一階段——經濟優先、安全為輔（1991～2003）

印度總理納勒辛哈·拉奧（P. V. Narasimha Rao；印度國大黨）在1991年7月開始了驅動印度東進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新經濟政策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於印度內部：

---

2. 印度和越南在1970年代越戰時期，由於意識形態上同樣傾向共產主義，故關係緊密，特別是在知識階層間。一個例子是，越戰時期尼赫魯大學的師生以運動支持越南時，以印地語呼喊出來的口號是「Mera naam, tera naam, Vietnam Vietnam」（越南、越南：是你的名，也是我的名）。2018年作者與印度某學者談話時所得。



1991年印度經常帳赤字引發的經濟危機以及蘇聯的垮台，使得印度開始檢討以往根基於社會主義計劃的經濟模式。該經濟危機使得印度不得不進行經濟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改革的主要項目包括：一、廢止或減少生產過程中各種不必要的許可證或執照；二、改善生產體系中，國有化程度過高的問題；三、放棄內向型貿易（inward-looking trade policy）並進一步開展國際貿易（Rangarajan 2016, 91-94）。

拉奧1994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演說中，正式使用了「東望政策」來指稱新經濟政策中的對外開放及交往的部分（Pardesi 2010, 128）。<sup>3</sup>從個人層次來看，總理及其幕僚的政策決定了和東南亞國家交往的方式和程度。拉奧決定利用冷戰結束的契機結合印度的新經濟政策走出去。選擇東南亞的理由是地理上東南亞距離最近，政治上東協已經運作多年，社會狀態穩定；此外，東南亞各國有許多印度僑民，能夠拉近與印度的距離。但是最重要的是，拉奧認為印度應該藉著「走出去」，學習不同的經濟模式，使印度擺脫舊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較於西方的經濟模式，東亞的「國家資本主義」更適合印度轉型期的需求（Sitapati 2016, 4562-4568）。

由是之故，東望政策的第一階段（1991～2003）與東協的交往以經濟為中心。在追求資本與市場的考量下，1992年印度成為東協部門別對話夥伴（Sectoral Dialogue Partner），並在1996年成為全面對話夥伴。在政治關係層面，原本恐懼印度巴基斯坦緊張關係影響的東協，對印度加入東協區域論壇（ARF）抱持遲疑態度，但在新加坡的運作下，印度最終還是加入了ARF做為制衡中國的另一股力量（Acharya 2015, 462）。而在安全議題上，雖然印度並未在

---

3. Pardesi認為，「東望政策」的雛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吉拉爾（IK Gujral）1989～1990年間在VP Singh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時。

多邊層面與東協完成任何制度安排，但在雙邊層面，印度與新加坡等國簽訂了防務協定，並完成了相關軍事演習架構的安排。從1995年開始，印度就與多個東協國家在安達曼及尼科巴（Andaman & Nicobar）群島舉行兩年一度的MILAN（印地語為「一齊、共同」之意）海上演習。印度也開始為新加坡武裝部隊提供訓練及場地。1993年，印度與新加坡開始了首次的海上雙邊演習SIMBEX（Das 2013, 165-185）。

1997年4月，人民黨（Janata Party）的古吉拉爾（I.K. Gujral）接任拉奧成為總理。其「古吉拉爾主義」外交政策主張印度作為大國，應不計回報地對待南亞鄰邦，並解決印度與其領土紛爭；同時，印度應該尋求與亞太國家在更多領域中的合作，並持續向東「尋求自己在亞太地區裡的身分。」（Pardesi 2010）古吉拉爾在1989至1990年間，曾於VP Singh政府擔任外交部長，負責調停越南、東協和柬埔寨之間的紛爭。古吉拉爾本人的經歷對他繼續推動與東協國家間的交往有明顯的影響。6月，由泰國發起，包含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的「孟印斯泰經濟合作倡議（BIST-EC）」在曼谷成立。BIST-EC後來吸納了緬甸（1997年）、尼泊爾及不丹（2004年），並更名為「環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IMSTEC）。

1998年，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簡稱：BJP）的瓦帕依（Atal Bihari Vajpayee）再度接任總理。<sup>4</sup>1997至98年間的東南亞經濟風暴，以及1999年印巴卡吉爾（Kargil）邊境戰爭並未減緩印度及東協關係的發展。2000年11月，成員包含印（度）、東、寮、緬、越，意在聯通印度次大陸及中南半島交通線的「湄公河－恆河合作倡議」（Mekong-Ganga Cooperation，以

---

4. 瓦帕依曾於1996年大選後組閣，但最終由於印度人民黨未能在國會人民院（Lok Sabha；下院）取得過半數席次，故其總理職位僅持續了13天。

下簡稱：MGC）成立。2002年，印度和東協建立高峰會夥伴關係（Summit Partnership），在瓦帕依的倡議下，雙方開始談判自由貿易區（Rao 2008）。2003年雙方在印尼峇里島簽署了《東協—印度經濟合作框架協定》（ASEAN-Indi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提出2012年前由部分國家先行組成自由貿易區的構想。2004年簽署了東協—印度CECA（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Asean，以下簡稱：CECA），做為自由貿易協議的暖身。印度並在同年和泰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

在瓦帕依的「擴大周邊」（extended neighborhood）政策下，東協繼續成為印度周邊外交的重點。瓦帕依對東南亞的持續重視，為東望政策提供了動力。他曾表示「說到印度的擴大周邊政策，就自然地想到東南亞」（Scott 2009, 107-143）。在雙邊關係方面，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外長楊榮文，自拉奧政府宣布東望政策以來，就持續在東協和印度之間發揮關鍵作用。為促進政治對話，瓦帕依也在2002年11月訪問了柬埔寨，參加了首次「東協—印度高峰會」（Ullekh 2017, 2976-2986）。會後，各國首腦在金邊發表《共同聲明》，指出除了拓展更親密的經濟與發展合作關係外，雙方也將加強在ARF內部的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及設立信心建立機制（CBM），以促進區域和平穩定（ASEAN 2002）。2003年10月，東協和印度在峇里召開第二次東協—印度高峰會。會中印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The Hindu 2003）。

在雙邊安全關係方面，印度在2000年與越南簽訂首個防衛合作協定。印越雙方承諾就情報交換、打擊海盜、應對內部叛亂等展開合作。印度將為越南海空軍的俄製裝備提供備料，同時在必要時也能提供反艦及防空飛彈。2003年，印越發表《關於印度共和

國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邁向21世紀之全面性合作框架協定之共同宣言》（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2003），依據協定規範印越兩國將定期舉行高層會晤，並在區域及次區域國際組織中協調一致立場，並將就安全及國防事務逐步加強合作（Grare 2017, 81-82）。

## 二、第二階段—多邊與雙邊框架的進一步構築 （2003～2014）

2003年9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瓦帕依政府的外交部長亞許旺·辛哈（Yashwant Sinha）宣布印度的東望政策進入「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第二階段除了把地理範圍由東南亞擴展到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及澳大利亞等國外，印度和相關國家的合作，也將不僅限於經濟議題，而包括反恐、共同演習、航道保護等安全與軍事層面（Mohan 2003）。

2004年5月，國大黨在拉吉夫·甘地遺孀索尼婭（Sonia Gandhi）的領導下重新執政。義大利裔的索尼婭因其身分不便，選擇了在黨內沒有派系的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成為總理，代為執行黨內重要政策。辛格是拉奧時期的財政部長，親歷經濟危機，並參與了「東望政策」的決策。其私人秘書回憶，辛格本人對東亞及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有著長期的關心和興趣，並告知其此為將來重要的外交議題。辛格延續了重視交往和貿易的「古吉拉爾主義」，追求與各強權（美國、中國）以及印度的重要貿易夥伴，特別是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全面和平關係（Baru 2014, 25）。

辛格個人對於東望政策的堅持及興趣，使印度在與東協各國簽訂種種貿易協定、以及進一步整合而面臨來自國內的壓力之時，能延續政策的方向。2004年，雙方簽訂《東協—印度和平、進步及共享繁榮夥伴關係》（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此份又名《願景2020》（Vision 2020）的協定列出關於政治和安全、經濟以及社會和文化三大方面的合作

(ASEAN)。2005年，在中國的反對下，印度仍然受邀加入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以下簡稱：EAS），使得印度與亞太地區的關係更為深化（Rao 2008）。

經過6年的協商，印度和東協2009年8月13日在河內簽署《貨品貿易協定》做為「東協—印度自由貿易區」（ASEAN-India Free Trade Area，以下簡稱：AIFTA）的第一階段。《協定》於2010年1月生效。在協商過程中，印度國內曾經有極大的反對聲浪，特別是來自於西孟加拉（West Bengal）及喀拉拉邦（Kerala）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派（CPI(M)），反對的理由是AIFTA會傷害農場工人的利益。印度國大黨的喀拉拉支部向索尼婭·甘地施壓，要求辛格放棄簽署FTA。辛格在覆信索尼婭時表示，政府對區域貿易協定的決定，特別是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審慎考量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後而為之（Baru 2014, 70-71）。辛格也擅於利用政治手腕平衡來自國大黨高層以及地方政黨的壓力（Baru 2014, 76）。

在務實主義的總理辛格執政期間，印度和東協及東亞各國達成多個雙邊經貿協定，如2005年《印度—新加坡全面性經濟合作協定》（India-Singapor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簡稱：CECA）、2009年《印度—韓國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協定》（India-Kore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CEPA）、2011年《印度—馬來西亞全面性經濟合作協定》及《印度—日本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9年，首屆1.5軌的年度雙邊論壇「德里對話」（Delhi Dialogue）在印度舉行。2010年10月30日，東協和印度在第17次在河內舉行的高峰會中，發表第二次《執行東協—印度和平、進步及共享繁榮夥伴的行動計畫（2010～2015年）》（2010～2015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該行動計畫除了增列了追蹤機制，籌設了

「東協—印度要人小組」（ASEAN-India Eminent Group，簡稱：AIEPG），由主要是負責相關事務的各國官員組成，推行並監督《行動計畫》的運行。要人小組將每年就《行動計畫》執行狀況撰寫進度報告，送交每年的東協加印度擴大外長會議（PMC+1）以及東協-印度高峰會參考。第一次要人小組會議於2011年8月3日在金邊舉行（ASEAN 2011）。

在2012年12月舉行的東協-印度20週年紀念對話夥伴關係20週年高峰會上，雙方發表了《願景宣言》（Vision Statement），將雙邊夥伴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關係，透過各層級政府、國會、商界、科學界、智庫、媒體、年輕族群以及其他相關人士進行全方位合作。印度也支持東協2015年的三大共同體（政治安全、經濟與社會文化共同體）目標。政治安全的重點聚焦在海事安全及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上，強調透過2010年成立的「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以及既有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東協海事論壇（ASEAN Maritime Forum）進行對話的重要性。

在經濟合作方面，設定了2015年達成雙邊貿易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在《貨品貿易協定》（TiG）的基礎上，持續協商貿易暨投資的自由化。雙方也鼓勵透過既有的雙邊機制，如MGC與BIMSTEC等進行合作。而在之前的第10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2012年8月）中，東協加6國也同意儘速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的談判工作。在社會、文化暨發展合作上，強調了更大的「人與人之間」（people-to-people）的交流。印度並將持續支援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Cambodia, Laos, Myanmar and Vietnam，以下簡稱：CLMV四國）的人力資源發展、科技教育、英語教育等領域。雙方並將「聯通性」列入合作重點。印度將支

援「東協聯通性主要計畫」(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以及「東協2015年資通訊主要計畫」(ASEAN ICT Master Plan 2015)。雙方並同意加速既有的三邊公路(India-Myanmar-Thailand Trilateral Highway)以及湄公河-印度經濟走廊(MIEC)等建設計畫(ASEAN 2012)。

印度在外交體系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鞏固與東協的關係。2010年，印度外交部設立了「東協多邊事務司」(ASEAN ML Division)。2013年，總理辛格在第13屆東協印度高峰會中宣布，將向東協雅加達秘書處派出大使。首任大使Suresh Reddy於2015年1月上任。

從東望政策開始執行，乃至升級至東進政策以來，印度歷經不同黨派意識形態的政府，都沒有停止以東協為軸，加速與亞太地區貿易、交往、以及合作的態度。特別是在辛格時代，印度與東協完成了許許多多邊與雙邊架構的構築。

### 三、第三階段—政治及安全關係的提升和多方位關係的深化(2014～)

2014年11月，上任六個月、隸屬印度人民黨的總理莫迪，在緬甸首都內比都所舉行的第9屆東亞高峰會上宣布，將把以往的「東望政策」改為「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莫迪在大選時，就把東協特別放入印度人民黨的競選綱領：「相對於受大國利益引領，我們將主動與鄰邦及更遠的國家主動交往……採取強而有力的立場及步驟，我們不會遲疑……會持續增強我們與SAARC以及東協的關係。」(Jha and Singh 2016, 138)莫迪也將東進政策歸納成3個C，即Commerce(商業)、Culture(文化)以及Connectivity(聯通性)。

從「遙望」(look)改成「進行」(act)，動詞的轉變隱含著

加速並落實執行的含義。印度的「東望政策」從莫迪開始進入第三階段。其特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 著重安全關係的建構，特別是著重海軍外交和東協國家間的交流、並把對東協外交和其他架構（如美日關係、Quad）結合起來；2. 著重政治對話、提升多邊及雙邊的政治關係；3. 延續先前提出的聯通性計畫，著重以基礎建設將印度和東協連結起來；4. 呼應東協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增加文化（包括族裔）交流的重要性。

安全方面，印度持續並加強參與2010年設立的「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以下簡稱：ADMM+）。2016年印度海軍與ADMM+各會員國共同參演了海上反恐演習。2017年3月印度與ADMM+其他17個會員國（東協以及美、俄、日、韓、中、澳、紐）的陸軍部隊，在浦那舉行了維和相關的野戰演練，這也是印度史上舉辦過最大規模的外軍演習（The Economic Times 2016）。同年，印度也就軍事醫療以及人道救援/災害援助等議題，與ADMM+會員國召開了專家小組會議。

除了在多邊場域（如ADMM+）加強交流外，在雙邊的安全關係上，莫迪政府也進一步提升了軍事外交的規模及範圍。自2014年8月開始至2015年9月中，印度海軍共訪問了世界40個國家的港口，是歷來最大規模的訪問，其中包括新加坡、泰國、菲律賓賓等國。2014年印度舉行每兩年一次的印度米蘭軍事海上共同演練（MILAN），除了寮國和汶萊之外的東協國家全數參與（PIB 2014）。

2015年，隸屬西部海軍司令部的飛彈驅逐艦「西高止山號」（INS Sahyadri）對越南、菲律賓進行訪問。10月3日西高止山號訪問越南峴港海軍基地。11月1日該艦抵達菲律賓馬尼拉軍港，並與菲律賓海軍艦艇就熟練海上通信以及搜救程序等課目進行演練。印度海軍並於2016年2月以東道主的身分，在安得拉邦的軍港、東部



艦隊司令部所在的維夏卡巴特南（Visakhapatnam）舉辦第十一屆國際海上閱兵式（IFR 2016），越南、泰國、緬甸、印尼等海軍也派艦參與（劉奇峰 2016）。

在東協和印度互動的制度面上，雙方在2015年8月的東協印度外長會議中，通過了第三個行動方案（PoA 2016~2020）。該方案列出了更多的項目以及執行細節，增列了人權及善治（Good Governance）、對應極端主義的中庸政策（Promotion of Moderation）等項目，同時強調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海事合作上的重要性；在經濟合作方面，詳列出更多領域（如能源、運輸、旅遊、資通訊等）以及執行細節；在社會文化方面，強調了教育、年輕族群、文化、以及「人與人」交流的重要性。同時，雙方也同意加強東協秘書處功能的重要。為了確保項目的順利執行，雙方設立了東協—印度基金、東協—印度綠色基金以及東協—印度科學暨科技發展基金，並同意定期透過多層面的機制追蹤執行進度，每年的東協—印度外長擴大會議也將檢視年度的進度報告（ASEAN 2015）。

2017年11月第15屆東協—印度高峰會以及第12屆東亞峰會在馬尼拉舉行。莫迪在致詞時表示，「印度的東進政策是圍繞著東協而發展的，而東協在印太地區（Indo-Pacific）之區域安全架構的中心性至為明顯。」（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17）莫迪使用「印太地區」一詞的時間點，恰巧在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以及總統川普提出「印太戰略」之後，頗有呼應意味。同時，美日澳印四國的外交官員也在場邊會面，準備重啟四邊安全對話架構（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2018年1月印度史無前例地邀請東協十國領袖，參加紀念印度憲法頒布的共和日（Republic Day）活動，並於其後在新德里舉行東協—印度紀念高峰會，以紀念對話夥伴關係建立25週年、高峰

會夥伴關係建立15週年，以及戰略夥伴關係建立5週年。會後發表《德里宣言》，重新強調了加強政治及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三大領域的合作，同時提出儘速完成實體及數位聯通性，以及按照「第三次東協整合倡議工作計畫」（IAI Work Plan III）縮減東協內部發展差距的重要。

在東進政策的不同階段，各個總理及其幕僚的外交理念為政策的持續推行提供了重大的助力。拉奧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的開放態度，啟動了印度對東南亞的交往模式。繼任的總理古吉拉爾由於先前在外交部處理越南事務的經歷，使其支持並延續了既有政策。在左派的國大黨政府期間，總理曼莫漢辛格擋住了來自黨內的壓力，並進一步推動多邊框架的構築。辛格的立場，明顯受到他本人先前在拉奧政府內擔任財政部長，以及更早之前在聯合國體系內任職的影響。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印度人民黨的總理瓦帕依在大國政治的考量下，持續對東南亞採取務實的親近政策。瓦帕依是莫迪政治上的導師，在他總理任內提拔了莫迪成為古吉拉特邦的邦長。莫迪在外交政策上，受到瓦帕依的影響非常大，自然也延續了瓦帕依的對東南亞外交路線，並進一步將之升級為「東進政策」。

### 參、宏觀數據中的「東進政策」：雙邊關係的分析和檢視<sup>5</sup>

印度的「東進政策」在2012年和東協簽署戰略伙伴之後，特別是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之下，呈現出什麼樣的發展？本部分

---

5. 選擇2013年是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在2012年10月宣布。本研究認為，東進政策必須與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相比較，故選擇由2013年開始數據分析。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用以分析之數據集（dataset）的資料僅收錄至2016年底。本節有部分引自作者2017年在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年會所發表之論文。見Roger C. Liu, “Go East, Young Man: Analyzing India’s Act East Policy i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 with Big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A 2017 Conference, Baltimore, USA.

運用了Google的「全球事件、語言及調性數據庫第一版（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GDELT 1.0）」的數據加以分析。GDELT資料庫以機器收集公開的每日英語新聞資訊，記錄全球範圍內獲報導的事件。事件是以成對數據（dyadic data）的方式被記錄，一個事件中至少有一個主動者（initiator）和接受者（receiver）。事件的性質涵蓋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各層面，而行為者除了國家外，也包含了組織、公司、或個人。其他資訊包括行為者的名稱、國家代碼（如果行為者是國家）、事件的性質、合作和衝突的程度、以及事件本身的發生地國家、區域及地理座標等變數。<sup>6</sup>分析選擇了東協10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汶萊、泰國、緬甸）和印度的雙邊數據。同時選擇了從2013年（戰略伙伴關係建立一年後）至2016年底的數據加以分析。使用的統計軟體是Stata 13英文版。

這裏隱含的一個假定是，由於機器蒐集的資料範圍廣泛，所以有相當的代表性。印度和東南亞國家不同的互動程度可以從事件的多寡判別出來：雙邊的事件量愈多，表示兩個社會的互動愈密切，反之亦然。

表一：印度與東協國家的互動頻率（2013年至2016年）

國家名稱	互動事件數	印度採取主動的比例
菲律賓	950	60.73%
越南	3069	54.68%
馬來西亞	4516	55.09%
新加坡	6683	51.99%
汶萊	423	58.87%

6. 作者要感謝匿名審稿人指出英語新聞做為事件來源可能產生的覆蓋性不足問題。作者曾與CAMEO計畫的主要主持人 Philip Schrodtt（時為賓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在2011年談及全球範圍之數據庫僅仰賴英語資料可能造成的局限性。Schrodtt教授指出，他和研究人員發現，有關中國的新聞事件並不會受到不同語言媒體的侷限而遺漏，因為在第一時間受到中文媒體報導的事件（特別是涉及國際或外交事務的重要事件），之後都會出現英語報導，所以事件並沒有缺失的問題。

國家名稱	互動事件數	印度採取主動的比例
東帝汶*	20	40.00%
泰國	4809	53.73%
緬甸	4686	58.90%
柬埔寨	308	47.44%
寮國	189	49.74%
印尼	3844	51.17%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GDELT資料製表。

\*東帝汶非東協會員國。此處列出為比較之用。

第一個衡量標準是雙方互動的密切程度。表一顯示出東望（進）政策實行20多年以來，最近幾年雙邊關係的互動程度。在東協國家中，和印度互動最密切的前三名分別是新加坡（n=6,683）、泰國（n=4,809）和緬甸（n=4,686）。新加坡從建國以來就和印度互動密切，也是印度前進東協各國的跳板，就算在莫迪時代，新加坡仍然是印度東進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泰國做為BIMSTEC的發起國，也顯示了密切的互動。緬甸近年來是東進政策的重點，與印度東北關係密切，互動量亦高。接下來是馬來西亞（n=4,516）、印尼（n=3,844）以及越南（n=3,069）。越南在近幾年與印度關係升溫，也反映在整體互動的密度上。與印度互動最少的後四名，分別是菲律賓（n=950）、汶萊（n=423）、柬埔寨（n=308）以及寮國（n=189）。印度在這四年間與柬埔寨和寮國的互動事件總數，甚至小於和僅有40萬人口的小國汶萊，而寮國和柬埔寨往往被視為親中國。

另一個指標也有助於衡量印度與東協國家的互動程度。本文使用了GDELT裡面的「主動者」和「接受者」資訊，衡量在兩國的關係中，哪一方採取主動的比例多。結合先前互動的頻率，可以衡量印度與特定東協國家的雙邊關係。印度在雙邊關係中採取主動，有兩種可能，一是印度看重兩國關係，二是另一國並不那麼看重與印度的關係，所以必須和互動頻率結合起來看。如果在一個雙邊關係中，有較高的互動頻率，印度同時更為主動（採取主動的比

例大於50%)，則雙方關係互動密切與正向。若低於50%，且互動頻率低，則表示新德里並不看重此雙邊關係。

### 一、測量印度和東協各國的雙邊關係強度及互動模式

表一的數據顯示，從2013年以來，印度較為主動發展關係的國家包括緬甸（58.9%）、馬來西亞（55.09%）越南（54.68%）及泰國（53.73%）。菲律賓互動頻率較少，但顯示出較高的主動性，可能是受到南海仲裁案的影響。柬埔寨和寮國，不但互動頻率低，印度的主動性也低（兩國皆低於50%，也是唯二低於50%的國家），反映出該兩國在東進政策內並不受重視。

這個排序，與Blank等人（2015）偏向質性的分析結果相當近似。他們的研究，以7個不同變數衡量印度和ASEAN國家的親疏程度。這7個變數分別是：聯通性、貿易、能源、外交/國際制度、安全合作、人道援助/災難救助/發展、平衡中國。加總起來，東協十國和印度的關係，按照親疏排序為：新加坡、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柬埔寨及寮國。第二至第六位順序略有不同（第三位同為緬甸），但第一位的新加坡和後四位的排名則相同。

資料顯示，經過20多年後，新加坡做為印度東進政策橋頭堡的地位仍然難以取代，故印、新兩國關係可以用來當做印度與東協關係的指標。菲律賓與印度疏遠，有其歷史。冷戰時期菲律賓與美國關係親近，為印度所忌憚，同時菲律賓離印度較遠，種種因素限制了印菲關係的發展。寮國和柬埔寨在地緣政治上被視為中國的「後院」，印度是否忌憚中國而避免進一步發展和兩國的關係，也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印度和寮東兩國關係的疏遠，也顯示了新德里與CLMV四國的關係發展，仍有進步的空間。

第二套指標是關於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表二）。分析中擬出了三個指標，分別是：

「與雙邊關係關聯的國家數目」(NOC)：GDELT包括涉及事件的其他國家。舉例來說，美國批評俄羅斯關於敘利亞襲擊事件的聲明。在俄敘兩國的雙邊關係中，美國就是關聯國。如果一個特定的事件有更多國家參與，顯示該起事件更加「國際化」，受到其他國家的關注愈多。以印美關係為例，從2013到2016年，兩國之間發生了95,646起事件，其中除了美印兩國之外，還涉及171個國家。這些事件當中，在印度發生的事件占55.88% (n=53,443)，在美國發生的則佔了32.72% (n=31,300)。印美兩國的雙邊事件牽涉到171個國家，代表雙邊關係全球化程度高。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東帝汶和印度的雙邊關係。兩國在2013~2016四年的時間內的雙邊關係(有20起事件)，僅僅涉及了一個國家，顯示出其關係的侷限，並未有太多國家牽涉其中。

「發生在第三國事件的比例」(PIFC)：GDELT的數據也包含了事件的發生地。互動若發生在兩國之內，表示事件僅僅為單純的外交關係。若發生在第三國，顯示雙邊關係可能受到第三國的影響。反之，若越多事件發生在兩國的領土上，表示雙邊關係有一定的獨佔性，不受外界干擾而較為封閉。以上述的事件為例，美國批評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是俄美兩國的雙邊關係。但就敘利亞來說，該起事件發生在華盛頓，顯示美國對其的潛在影響。假設牽涉敘利亞的事件發生在美俄的比例愈高，則表示美俄做為當事國而非旁觀國的可能性愈高。

「發生在美國事件的比例」(PIUS)：此項指標欲測量美國在特定雙邊事件中的影響力。美國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存在往往是一個難以忽視的因素，雖然印度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原則一直想要排除美國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但是美國從歐巴馬政府的「東亞再平衡」到川普的「印太戰略」，都會直接影響到印度東進政策的執行。這個指標的邏輯與上述的PIFC近

似：如果印度和另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生在美國的比例越高，美國在該雙邊關係的潛在影響力就越大。

這三種不同的衡量指標分別代表全球化水準、開放或是排他性的印度—東協國家關係，以及美國的潛在影響。

表二：印度與東協國家雙邊關係中的國際因素

印度的對象國	關聯國家數 (NOC) (Number of countries)	事件發生於第三國比例 (PIFC) (Proportion of the bilateral events taking place in any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事件發生於美國的比例 (PIUS) (Proportion of the bilateral events taking place in the US)
美國 (作為對照組) (n=97,626)	171	13.19628%	32.06113%
菲律賓 (n=955)	39	29.21466% (1)	5.96859% (1)
越南 (n=3076)	63 (2)	18.53056%	1.88557%
馬來西亞 (n=4516)	66 (1)**	16.20903%	1.74934%
新加坡 (n=6683)	66 (1)	12.02031%	1.55293%
汶萊 (n=423)	17	24.58629% (3)	1.41844%
泰國 (n=4813)	59	13.8583%	0.95574%
印尼 (n=3792)	52	15.91264%	1.71607%
緬甸 (n=4694)	60 (3)	25.64977% (2)	3.366% (2)
寮國 (n=189)	12	20.10582%	0%
柬埔寨 (n=312)	19	23.07692%	1.92308% (3)
東帝汶* (n=20)	1	10%	0%

來源：作者根據GDELT資料製表。

\*東帝汶非東協會員國。此處列出為比較之用。

\*\*括號後為排名

表二列出了印度東協雙邊關係內的國際因素。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和印度的雙邊互動中，牽涉到了66個國家，在東協國家當中排名第一。在印度和新加坡的雙邊關係中（n=6,683），發生在國外的事件僅佔了12%，在美國的約為1.6%，和其他雙邊關係相較相對較低。這顯示出新加坡和新德里的關係涉及範圍較廣（牽涉國家多）、雙邊關係較為獨佔（發生在兩國間的比例高）、美國涉入程度較低（表示雙邊的自主性較高）。這三個指標加起來，顯示出一個比較穩固而且新德里控制力較大的雙邊關係。可以被歸類在這個項目下的國家還有：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和印尼。

另一個極端是寮國和柬埔寨。這兩國和印度的雙邊關係中，牽涉的第三國數目分別只有12個和19個，顯示出了侷限的關係。但其雙邊關係受到第三國的影響相對又較高（分別是20%及23%）。在寮國，其中美國的影響力不存在（寮國—印度雙邊關係中發生在美國的事件是0）。這顯示了印度對該兩國的控制力較低，雙邊關係也不穩固。

緬甸和菲律賓則是另外兩種情況。印緬之間的交往較為密切、議題牽涉範圍廣，但是受到第三國影響大（25.6%），顯示除了印度，其他國家也意識到了緬甸的重要性並積極參與。雙邊關係中，美國的影響力較大，顯示了美國對印緬雙邊關係的關切和影響力。就此推論，美國和印度在緬甸議題上合作的潛力也比較大，因為雙方與緬甸都有較為強化的互動。

菲律賓雖然和緬甸類似，都有著較高的外國涉入（29.2%）以及美國涉入（近6%；這兩項指標在所有印度東協雙邊關係中排名首位），但是印菲兩國和印緬不同的是，印菲之間的互動強度低（n=955），範圍也較小（國際化程度低代表共同議題也較少）。所以這三套數據一起看，顯示的是一個不穩定、相對來說也不那密切的印菲關係。印菲雙邊關係在PIUS和PIFC兩項指標上較高，



也有可能是受到此段時間內南海岩礁仲裁案的影響，造成這段時間內的印菲關係，有較高比例是在南海仲裁案及中美海軍航行的脈絡中進行的。舉例來說，2016年夏季，美國海軍曾經探詢印度海軍，要求共同在菲律賓海域舉行共同巡弋任務，但為印度所拒絕。

第三套指標衡量的是印度與東協國家雙邊關係中的合作比例以及友好程度。一般來說，雙邊關係中存在著合作與衝突的關係，若合作大於衝突，雙邊關係則較為正向，反之則較為負向。使用GDELT的「衝突與調停事件觀察值」（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以下簡稱：CAMEO）編碼規則，被廣義地歸類為合作類比的事件包括：

- 1) 經濟合作：CAMEO代碼 061, 070, 071 和 085；
- 2) 政治合作：CAMEO代碼 063, 080, 081, 084, 0841 和 0842；
- 3) 軍事合作：CAMEO代碼 062, 064, 072, 074, 087, 0872, 0873, 和 0874；
- 4) 外交合作：CAMEO代碼050至 057；
- 5) 實質合作：CAMEO代碼060到064。<sup>7</sup>

對於衝突度量和類別，本文將CAMEO代碼重新歸類為三級衝突：

- 1) 第一級衝突：低強度事件，包括不贊成（disapprove）、拒絕（reject）、威脅（threaten）、抗議（protest）、阻撓（obstruct）等輕度的負面行為；
- 2) 第二級衝突：中強度事件，包括軍事姿態（military posture）以減少關係（reduce relations）和強制（coerce）、制裁（sanctions）等外交上交惡的行為；
- 3) 第三級衝突：高強度事件，包括襲擊（assault）、戰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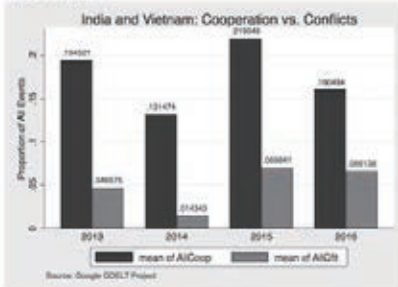
7. 關於各分類的細節，請詳見：<https://www.gdeltproject.org/data/lookups/CAMEO.eventcodes.txt>。

(fight) 和非常規暴力/核戰爭 (unconventional violence/nuclear war) 等準軍事或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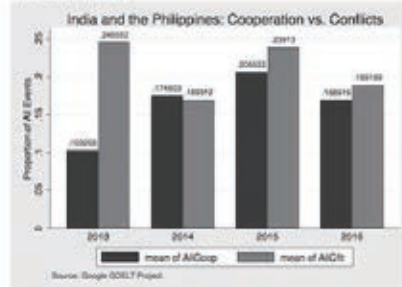
圖一之一及圖一之二以簡單的直方圖顯示出不同雙邊關係的合作及衝突之變化。直方圖上方的數字顯示的是合作或衝突事件佔總體事件的比例，如2013年，越南和印度的雙邊關係中，有0.194521，即約19.5%是合作事件，而衝突事件則佔了僅約4.7%。

圖一之一：印度和東協國家雙邊合作-衝突比例（藍色為合作，紅色為衝突，數字為小數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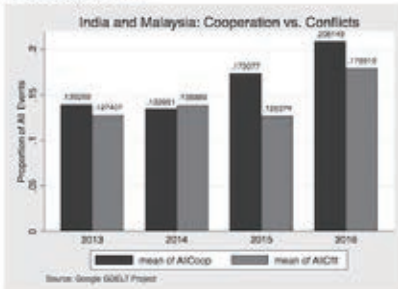
### 印度與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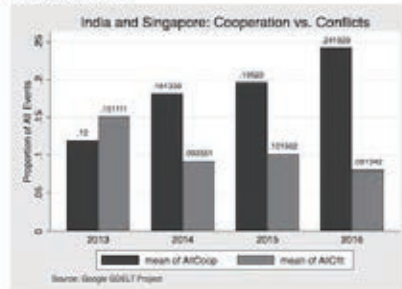
### 印度與菲律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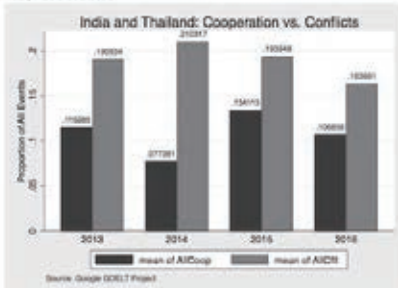
### 印度與馬來西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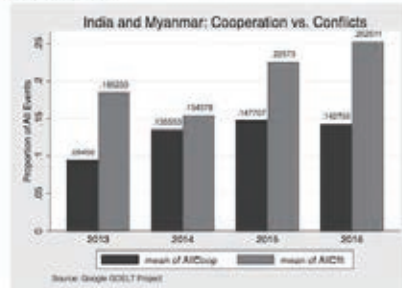
### 印度與新加坡



### 印度與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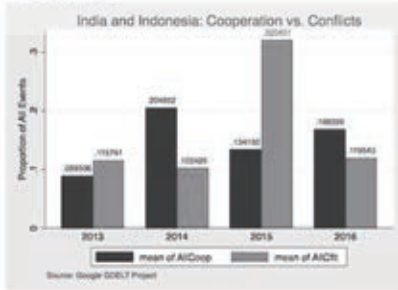


### 印度與緬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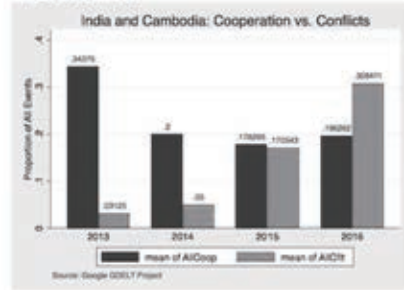


圖一之二：印度和東協國家雙邊合作-衝突比例（藍色為合作，紅色為衝突，數字為小數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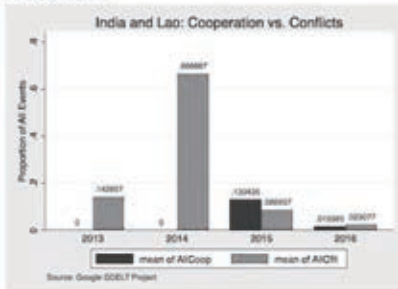
印度與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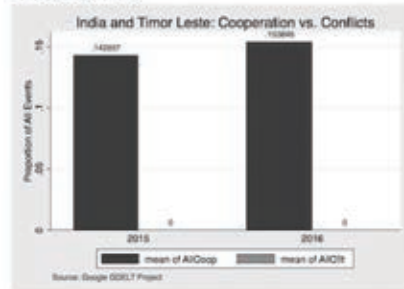
印度與柬埔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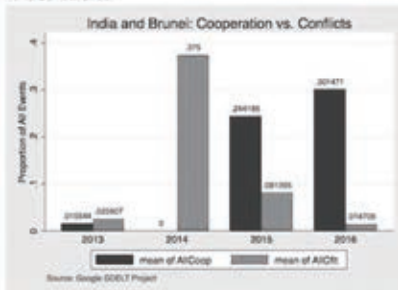
印度與寮國



印度與東帝汶\*



印度與汶萊



\*東帝汶非東協會員國。此處列出為比較之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2013至2016年以來，新加坡和越南非常顯著地和印度有著壓倒性的合作關係。新加坡和印度的合作關係逐年增長，而衝突比例

則逐年下降，反應了印度的「東進政策」在新加坡的進展。越南也有著很高的合作比例，特別是相較於衝突來說。而這兩個國家，與印度的互動強度（以雙邊事件的數量來衡量）也很高。相較之下，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合作指數雖然也和新加坡一樣逐年上升，但其衝突比例也呈現增長的態勢。

和印度互動也密切的泰國和緬甸，則呈現了衝突大於合作的樣態，反映出印度與這兩國的關係並未如新加坡和越南友好。而印度和緬甸的衝突逐年上升，可能反映出東進政策推展到緬甸時雙方發生的摩擦。寮國和柬埔寨則是衝突大於合作。柬埔寨和印度的合作逐年下滑，反應出親近中國所造成的影響。而寮國和印度的雙邊往來本來就不密切，關係中衝突還佔大多數，關係的疏遠可以想見。

## 二、中國—東協和印度—東協的互動比較

莫迪宣佈「東進政策」的時機，剛好和習近平宣佈「一帶一路」的時間相近。東協國家是「一帶一路」的「戰略核心區」，對中國來說，比被歸類為「戰略支撐區」的南亞地區更為重要（于立新等）。同樣的，印度也將東協視為東進政策的核心。中國和印度與東協整體的互動狀況也能看出兩國經略東南亞的成績。

分析結果顯示（表三），無論是在多邊外交的規模還是參與比例上，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都大於印度。從2013年10月到2016年9月，GDELT 記錄、涉及中國與東協的雙邊交往的事件有25,820起。而在同期，印度與東協的接觸，卻僅有475起。就算考慮機器蒐集數據可能產生的誤差，其間也存在著極大的差距。在中國和東協的關係上，合作事件有5,465件，佔了總數的21.13%。而印度和東協的合作事件則為63件，佔比為13.26%。不管是總體互動的強度和合作的比例，中國都比東協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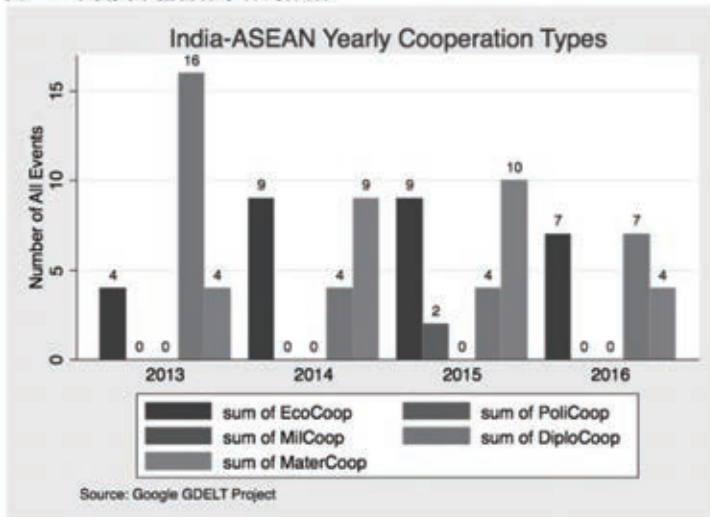
圖二及圖三是中國和印度與東協合作關係的分類。中國對東協的外交合作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從2013年的n=654穩步增長到2016年的 n=1,623。除此之外，其他種類的合作，如經濟合作和政治合作也逐步上升。印度的趨勢則沒有呈現趨勢；外交合作在2014和15年出現了下滑。從GDELT從公開資訊蒐集的數據來看，印度和做為國際組織的東協交往頻率低落，同時也反應了印度這些年來，與其他大國相比並不重視與東協的外交，印度的民間整體上來說也欠缺興趣。

表三：中國與印度和東協合作事件的比例（2013-2016年）

	中國-東協	印度-東協
合作事件數（百分比）	5,456 (21.13%)	63 (13.26%)
非合作事件數（百分比）	20,364 (78.87%)	412 (86.74%)
總數	25,820 (100%)	47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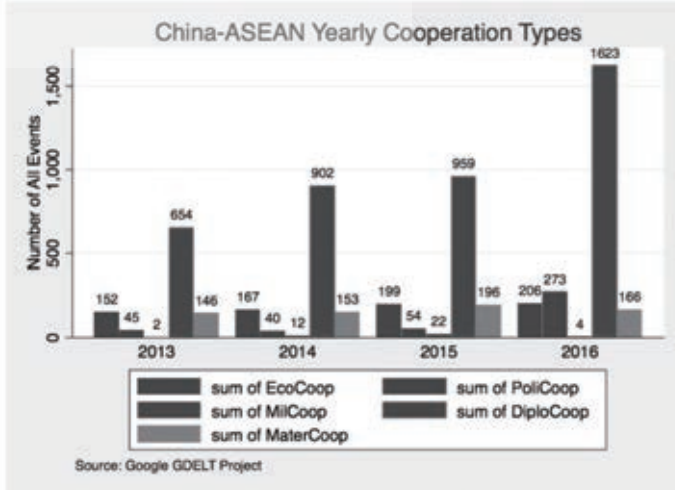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二：印度與東協合作事件的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三：中國與東協合作事件的分類



EcoCoop=經濟合作；MilCoop=軍事合作；MaterCoop=實質合作；PolCoop=政治合作  
DiploCoop=外交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 肆、五個面向：貿易、制度建構、安全、聯通性及執行上的問題

印度和東協的關係也可以由幾個大的面向或是問題點來觀察。這些問題點，分別是貿易與發展、制度建構、軍事與安全、東北部及聯通性。在貿易和發展方面，目前印度對東協整體的進出口比例，和剛開始建立關係的時候相較，有明顯的上升。從2011到2015年的五年之間，印度對東協整體的出口比例大致持平，約在9~11%左右，但進口量則是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8.72%到2015年的10.62%（De and Chirathivat 2016, 78）。不過，東協和印度的FTA（貨品貿易協定）在2010年生效之後，並未達成原先設定的在2015年前每年1000億美元貿易額的目標。2015~16年，雙邊的總貿易額是650億美元。印度對東協的出口，在FTA生效後，曾經

在2013~14年達到了331億美元，但在2015~16年就回落到251億美元。但是印度對東協的貿易赤字卻快速攀升，由TiG生效前的76億美元（2009~10）變成147億美元（2015~16）（Raghavan 2017）。這也是為什麼新德里在與東協談判RCEP的時候，希望儘速達成服務業及投資准入的原因，但是由於東協方面與印度未能達成共識，故RCEP的談判目前陷入了僵局。

制度建構方面，截至2017年底，印度和東協已經建立了30個固定的對話機制，包括年度的東協—印度高峰會，七個涵蓋下述領域的部長級會議：外交、商務、旅遊、農業、環境、可再生能源以及電信等議題（MEA 2017）。東協和印度已經建立起了多層次的，包括官方和半官方在內的溝通管道。

軍事和安全方面，如前所述，印度在東協這個平台上，運用包括ADMM+及EAS等多邊會議，加上先前建立的、納入東協國家的諸如MILAN等演習，已經成功進行了反恐、人道救援及災難援助以及反潛等科目的演練；同時，透過「印度洋海軍論壇」（IONS）等納入東協國家海軍的組織，也建立了綿密的、重疊的多邊架構。在雙邊層面上，每兩年一次的「印度—印尼共同巡弋」（India- Indonesia Coordinated Patrol，簡稱：IND-INDO CORPAT）、BILAT、KOMODO（人道援助及災害救援）等演習、與ARF有DIREx演習、印緬之間有IMCOR（共同巡弋）演習、與新加坡有SIMBEX演習、與泰國則有CORPAT演習。

「東進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政策目的是建立與中南半島上幾個重點國家的聯通性，同時帶動並促進印度東北部七個邦的發展。印度東北部的七個邦（又稱「七姐妹」）地處山區，地形高聳，與緬甸、中國、不丹等國接壤。包括曼尼普爾（Manipur）、那加蘭（Nagaland）及米佐拉姆（Mizoram）在內的邦有武裝叛軍問題；被中國稱作「藏南地區」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

與中國有未定界問題；印度東北部並與緬甸若開邦（Rakhine）接壤，受難民、族群宗教衝突等安全上的威脅，在地緣政治上處於脆弱的狀況。印度政府想藉由開發東北部來緩解上述的安全問題。

要達成開發東北部的目標，就必須整合印度和孟加拉灣周邊的國家，以形成經濟群落的方式來促進發展。1997年成立的BIMSTEC及MGC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促進印度與東協發展的後進國CLMV四國的聯通性。聯通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交通基礎設施的聯通，另一個是軟基礎設施（soft infrastructure），即網路、通關、貿易便捷性等促進商業發展的制度性聯通。印度計劃以兩個主要計劃「印緬泰三方公路」以及「喀蘭丹多重模式運輸計劃」（Kaladan Multi-modal Transit Transport Project，以下簡稱：KMTTP），以建設交通和工業走廊的方式，將東北地區與CLMV四國連接起來，達成促進發展的目的。

在第二個（2010～2015）及第三個（2016～2020）東協印度行動方案中，聯通性開始受到重視。但是進展緩慢卻是一個大問題。以印緬泰三方公路為例，這個在瓦帕依政府（2002年）就提出的計劃，完工日期卻一延再延，由原先的2014年延期到2020年（Tai 2017）。9年之間三國的官員召開了6次會議，計劃卻始終停留在概念階段，原本預計要延展至越南的理想也無限期推遲（Das 2016, 120-130）。

另一個計劃KMTTP也受到了延宕。KMTTP的構想是結合海運、內陸運河及公路的方式，將印度東北的米佐拉姆邦與加爾各答連接起來。從加爾各答運出的貨物將跨過孟加拉灣航行539公里至緬甸的實兌港（Sittwe），再由此通過159公里長的運河將貨物運送到帕雷脫（Paletwa），最後經129公里的公路運輸至米佐拉姆邦，途中通過有族群衝突的緬甸若開邦以及欽邦。印緬雙方在2008年簽署了框架協議。當時的印度政府批准了近53億6千萬盧比的預算



(Frontier 2017)。莫迪上任後，追加預算至290億盧比，其中包含了對緬甸實兌港的投資。該港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主要關鍵港口，印度若能搶得先機，戰略意義重大。

不過，印度國會內政委員會於2018年4月提交報告指出，預計2016年12月投入運營的KMTTP，目前進度仍然落後。預計10年後，通往米佐拉姆邦的公路仍未完工（Ramya 2018）。報告結論指出KMTTP作為東進計劃的一部分，具重大戰略利益，建議內政部應當主導KMTTP並負起全責，以解決困難、加速推動計劃的運行（The Telegraph Online Edition 2018）。

另一個關於聯通性的空運方面，印度和東協國家雖然簽訂了開放天空協定，但幾年下來，印度和東協的空運樞紐仍然集中在曼谷、新加坡以及吉隆坡，只有5國和印度有直接航班聯結，其他包括柬埔寨、印尼、寮國、菲律賓及汶萊都沒有直接航班。客運方面，印度旅客前往東南亞的多，但是東協旅客前往印度的卻少很多，呈現了不平衡的狀態（ASEAN-India Air Connectivity Report 2016）。還有一個例子是越南。雖然兩國政府間關係日漸熱絡，但民間的往來仍稍嫌不足。2014年印越兩國政府允諾的直接航班目前已未復存在。

聯通性所遇到的問題是印度和東協交往的一個縮影：印度和東協在東望/東進政策的架構下，雖然建立了綿密、多層次的政府間溝通網絡及多邊架構，但在計劃的實際執行層面效率卻不盡人意；雖然簽署了夥伴關係等架構，但是實際上的關係仍待進一步建構。印度各部門間缺乏協調整合、監督機制付之闕如，以及財政上的限制都造成了計劃的延期。特別和中國相比，印度在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上規模小很多。以緬甸來說，2015~6年度，印度投資了約2.3億美元在緬甸，但同期中國的投資額卻是33億美元，是印度的10多倍（Ramachandran 2016）。

許多東進政策下的戰略計劃未能如期執行，影響到了東協國家對印度的觀感，也使印度的形象和中國相比時屈居弱勢。很多東協國家覺得印度不願或無力進一步調配資源在促進區域安全等議題上，在東南亞事務中，新德里也不願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這使得一些東協國家感到失望（Blank et al 2015, 11-17）。

行政效率也許能解釋印度和東協交往時的延宕，但是政治文化的影響因素可能更為關鍵。Arndt Michael（2013）針對四個印度洋地區的多邊機制研究時發現，一般解釋東協成功的「規範地方化」（norm localization）過程並不能套用在印度的例子上。在印度主導的國際機制中呈現的是一種「規範昇華」（norm sublimation）的過程，即印度在加入由別國倡議的國際機制（如泰國發起的BIMSTEC）或是自己倡議的組織後，會用本身的政治文化，強勢改變原有的機構設定。到後來，原有的多邊機制精神被印度化而成為了「空有軀幹的多邊主義」（the torso, or Panchsheel Multilateralism），造成印度同時加入多個功能重疊的多邊機制，但在實際執行上卻無法達成相輔相成的目標，反而導致欠缺效率的結果（Michael 2013）。Jonah Blank等人（2015）也引述訪談的印度官員表示，印度官方比較在乎被邀請進入多邊機制會談，至於談什麼沒有那麼重要。

這種形式重於實質的思維也反映在安全政策上。一名相關國家的外交官員提及印度的海軍巡弋時，說「不就只是那一艘軍艦在那邊開來開去嗎？」<sup>8</sup>該官員指的是2015年訪問東協各國的驅逐艦「西高止山號」（INS Sahyadri）。西高止山號從2012年編入作戰序列之後就一直執行訪問東協國家的相關任務。2018年5月下旬，印度海軍訪問越南峴港舉行雙邊演習時，西高止山號仍然是主力。這種運用的方式，顯示了形式上的海軍外交仍然大過實質上的全

---

8. 作者訪談，官員，新德里，2015年。

面演練。同時，印度海軍艦隊建設的遲緩所造成的力有未逮，也為將來和東協的海上合作、甚至進一步扮演對中國的平衡者角色（balancer）投下了變數。

國內政治文化的影響也反映在RCEP的談判上。東協國家一直希望儘速與相關各國達成協議，但印度卻不斷推遲。印度希望將投資與服務協定納入談判，但RCEP的其他成員國卻希望能達成進一步的關稅減讓（Chowdhury 2017）。保護主義思維（Mitra 2018），以及恐懼RCEP將進一步造成中國製商品湧入印度國內市場，而傷害國內的鋼、鋁、工業、紡織及汽車零部件等產業的想法，都讓印度裹足不前（Arun S 2017）。而印度即將於2019年5月舉行大選，攸關印度人民黨和莫迪是否能繼續執政，在工業界大多反對的情況下（The Hindu 2018），今年要達成RCEP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樣的政治思維很有可能傷害印度的長期利益，使得印太地區整合的藍圖胎死腹中（Philip 2018）。

## 伍、結論

本文以不同方法及層次呈現印度和東協的關係發展。在第一部分以歷史方法追溯了自冷戰時期以來印度和東南亞國家及東協的交往，在第二部分以公開數據分析了印度「東進政策」下，印度和不同東南亞國家雙邊關係的結構，而在第三部分則以相對微觀的角度，探討了印度對東協政策的四個面向，同時分析了執行上的相關問題。印度在1991年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而實行的「東望政策」27年來在雙邊和多邊的制度建構上，從無到有，極大地密切了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回顧歷史，不同屆黨派立場相異的印度政府，都能在關鍵的時期，持續地推進與東協

國家的交往，顯示了印度外交的靈活、務實及變通。

但在交往廿多年後，種種問題也開始浮現。首先，印度的東進政策在結構上仍然太過倚重特定國家。從一開始就作為印度和東協引線人的新加坡，目前仍然是東進政策的橋頭堡；而越南則在安全關係上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雖然印度一直嘗試著通過多邊機制（如BIMSTEC和MGC）以及聯通性計劃（如印泰緬三方公路和KMTTP）來連接中南半島上的東協國家，但寮國和柬埔寨和印度的雙邊關係，在這幾年仍然相對疏遠。有可能印度僅想透過越南、緬甸及泰國推進聯通性計劃，但隨著中國與柬埔寨和寮國在「一帶一路」下的逐步親近，新德里在寮東兩國若仍欠缺影響力，有可能對進一步整合帶來不利的結果。

廿多年來，雖然印度和作為多邊組織的東協以及其會員國，透過各級會議、夥伴關係、經貿合作協議等建立了多層次的架構，但是執行上往往落後時程，有時會流於「紙上外交」或是「宣示外交」（declaratory diplomacy）。這一點在面對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的時候更顯迫切。印度與東協交往的頻率、強度和影響力皆低於中國。而在微觀層次，兩個重要聯通性計劃的延宕，顯示出印度的政治文化在多邊和雙邊交往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同時反映在安全事務的合作，以及經貿關係的進一步深化上。這也將為印度及東協接下來的整合，帶來無可避免的挑戰。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 于立新等主編，2016，《國家戰略：「一帶一路」政策與投資：沿線若干國家案例分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Yu, Lixin. *Guojia zhanlue: "yidai yilu" zhengce yu touzi: yanxian ruogan guojia anli fenxi* [National strategy: Investment and Policies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 case analysis of several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ngzhou: Zhe Jiang University.
- 方天賜，2001，〈印度實施經濟改革以來的外交走向〉，《問題與研究》，40（4）：81-96。Fang, Tien-sze. 2001. "Yindu shishi jingji gaige yilai de waijiao zouxia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Since Economic Reform]. *Taipei: Wenti Yu Yanjiu* 40 (4): 81-96.
- 林侑靜，2016a，〈印度在東南亞安全中之角色建構：東協中心取向分析〉，《全球政治評論》，53：83-118。Lin, Yi-ching. 2016. "Yindu zai dongnanya anquan zhong zhi jiaose jiangou: dongxie zhongxing quxiang fenxi"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ia's Security Role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 "ASEAN-centric" Orientation]. *Taiwa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3: 83-118.
- 林侑靜，2016b，〈印度與東協經濟合作之發展與檢視：東向政策效應〉，《台灣東南亞學刊》，11（2）：3-44。Lin, Yi-ching. 2016. "Yindu yu dongxie jingji hezuo zhi fazhan yu jianshi: dongxiang zhengce xiaoying" [Indi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ook East Policy (in Chinese)].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1 (2): 3-44.
- 張棋忻，2016，〈印度對外政策剖析：從「東望」邁向「東進」〉，《國際與公共事務》，4：67-102。Chang, Chi-shin. 2016. "Yindu duiwai zhengce pouxi: cong 'dongwang' maixiang 'dongj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From 'Looking East' to 'Acting East']. *Taiwan: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4: 67-102.
- 劉奇峰，2016，〈2015年印度海軍發展評析〉，《亞太觀察評論》，3。Liu, Roger. 2016. "2015 nian yindu haijun fazhan pingxi" [2015 Analysis of Indian Navy Development]. *Taiwan: Asia-Pacific Watch* 3.
- 蔡東杰，2007，〈印度東進政策下的東南亞角色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4（2）：3-24。Tsai, Tung-chieh. 2007. "Yindu dongjin zhengce xia de dongnanya jiaose fenxi"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4 (2): 3-24.

## 二、英文

- Acharya, Amitav. 2015.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n David Malone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charya, Amitav. 2017. *East of India, South of China: Sino-Indian Encounters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EAN. 2011. "ASEAN-India Eminent Persons Meet to Discuss Future of Relations-Phnom Penh." <https://asean.org/asean-india-eminent-persons-meet-to-discuss-future-of-relations/>. (Accessed April 8, 2018).
- ASEAN. 2011.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asean-india-partnership-for-peace-progress-and-shared-prosperity-2](https://asean.org/?static_post=asean-india-partnership-for-peace-progress-and-shared-prosperity-2). (Accessed April 8, 2018).
- ASEAN. 2002.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irst ASEAN-India Summit Phnom."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9334/Joint+Statement+of+the+First+ASEANIndia+Summit+Phnom+Penh+Kingdom+of+Cambodia>. (Accessed April 8, 2018).
- ASEAN. 2012.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2020)." [https://asean.org/storage/images/2015/August/POA\\_India/ASEAN-India%20POA%20-%20FINAL.pdf](https://asean.org/storage/images/2015/August/POA_India/ASEAN-India%20POA%20-%20FINAL.pdf). (Accessed April 8, 2018).
- ASEAN. 2012. "Vision Statement ASEAN India Commemorative Summit." <https://asean.org/vision-statement-asean-india-commemorative-summit/>. (Accessed April 8, 2018).
- ASEAN-India Centre at RIS (AIC). 2016. "ASEAN-India Air Connectivity Report." Delhi: ASEAN-India Centre at RIS.
- Arun S. 2017. "India's concerns slowing RCEP talks." <https://www.thehindu.com/business/indias-concerns-slowing-rcep-talks/article19359808.ece>. The Hindu (Accessed April 10, 2018).
- Baru, Sanjaya. 2014. *The Accidental Prime Minister: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Manmohan Singh*. New Delhi: 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Private Limited.
- Blank, Jonah et al. 2015. *Look East, Cross Black Waters: India's Interest in Southeast Asia*.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Chowdhury, JR. 2017. "Regional Trade Pact Falters"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

com/business/regional-trade-pact-falters/cid/1477797. The Telegraph (Accessed April 30, 2018).

Das, A. K. 2013 “Soft and Hard Power in India's Strategy Toward Southeast Asia” *India Review*. 12 (3):165-185.

Das, Gurudas, 2016. “India’s Myanmar Policy” in Das and Thomas eds. *Look East to Act Eas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ndia’s Northeast*. Delhi: Routledge.

De, Prabir. Chirathivat S. 2016. *Celebrating the Third Decade and Beyond: New Challenges to ASEAN-India Economic Partnership*. KW Publishers Pvt Ltd.

Frontier. 2017. “India blames Myanmar for Kaladan project delays.” <https://frontiermyanmar.net/en/india-blames-myanmar-for-kaladan-project-delays>. (Accessed April 29, 2018).

Grare, Federic. 2017. *India Turns Eas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US-China Rival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ha, N. N. and S. Singh. 2016. *Modi’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elhi: Pentagon Press.

Kaul, Manmohini. 2016. “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Evolut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Pacific” in M. Kaul and A. Chakraborty eds. *India’s Look East to Act East Policy: Track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Liu, Roger C. 2017. “Go East, Young Man: Analyzing India’s Act East Policy i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 with Big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A 2017 Conference. Baltimore, US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2014. “15th ASEAN-India Summit and 12th East Asia Summit in Manila, Philippines.” [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02/15th\\_ASEANIndia\\_Summit\\_and\\_12th\\_East\\_Asia\\_Summit\\_in\\_Manila\\_Philippines\\_November\\_14\\_2017](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02/15th_ASEANIndia_Summit_and_12th_East_Asia_Summit_in_Manila_Philippines_November_14_2017). (Accessed May 1, 2018).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2017. “Presentation of Credentials by H.E. Mr. Suresh K. Reddy as Ambassador of India to ASEAN.” <http://mea.gov.in/aseanindia/press-releases.htm?dtl/22573/Presentation+of+Credentials+by+HE+Mr+Suresh+K+Reddy+as+Ambassador+of+India+to+ASEAN>. (Accessed May 1, 2018).

Michael, Arndt. 2013.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dia).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under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commerce.gov.in/trade/ASEAN-India%20Trade%20in%20Goods%20Agreement.pdf>. (Accessed May 10, 2018).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2003.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s they enter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7658/Joint>. (Accessed May 5, 2018).
- Mitra, Devirupa. 2018. “Twenty-Five Years On, India, ASEAN Want to Be in Sync, but Keep Missing Cues.” <https://thewire.in/diplomacy/twenty-five-years-india-asean-want-sync-keep-missing-cues>. The Wire (Accessed May 1, 2018).
- Mohan, C.Raja. 2003. “Look East Policy: Phase Two.” <https://www.thehindu.com/2003/10/09/stories/2003100901571000.htm>. The Hindu (Accessed May 3, 2018).
-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dia). 2017. “PM’s Opening Statement at 15th ASEAN-India Summit, Manila.” [http://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opening-statement-at-15th-asean-india-summit-manila/](http://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opening-statement-at-15th-asean-india-summit-manila/). (Accessed April 15, 2018).
- Pardesi, Manjeet. 2010. “Southeast Asian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Sumit Gangu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 JT. 2018. “RCEP as a catalyst for deepening Asean’s partnership with India.” <https://www.livemint.com/Politics/blAwg6qHHFL3MjjZPYnF8N/RCEP-as-a-catalyst-for-deepening-Aseans-partnership-with-In.html>. Live Mint (Accessed May 3, 2018).
-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PIB). 2014. “17 Nations 15 Ships Demonstrate a Momentous ‘Milap’: Milan 2014 an Unequivocal Success.”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03278>. (Accessed April 15, 2018).
- PTI. 2014. “Direct flight to Vietnam from Nov 5.” <https://www.thehindu.com/business/Industry/direct-indiavietnam-air-service-from-november-5/article6412724.ece>. The Hindu (Accessed April 29, 2018).
- Rangarajan, C. 2016. “Economic Reform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in Uma Kapila ed. *Indian Economy Since Independence*.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 Raghavan, P. 2017. “India’s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sean has only had a limited impact.”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minorityview/indias-free->



- trade-agreement-with-asean-has-only-had-a-limited-impact/. The Times of India Blogs (Accessed April 15, 2018).
- Ramachandran, Sudha. 2016. "The Trouble with India's Projects in Myanmar."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the-trouble-with-indias-projects-in-myanmar/>. The Diplomat (Accessed April 20, 2018).
- Ramya, PS. 2018. "Myanmar's Approach to India."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3/myanmars-approach-to-india/>. The Diplomat (Accessed April 15, 2018).
- Rao, R.V. 2008. *India and ASEAN: Partners at Summit*. Delhi: KW Publishers Pvt. Ltd.
- Saran, Shyam. 2018. "India-Asean Ties: A Cup Half Full?"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india-asean-ties-a-cup-half-full/story-CetCGMx6nXmIPC8BHGwAJL.html>. Hindustan Times (Accessed April 15, 2018).
- Scott, D. 2009. "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 *India Review*. 8(2): 107-143.
- Sitapati, Vinay. 2016. *Half-Lion: How P.V. Narasimha Rao Transformed India*. Kindle Edition; 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Private Limited.
- Tai, Jonathan. 2017. "Why India Isn't Really 'Acting East' in Myanmar."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why-india-isnt-really-acting-east-in-myanmar/>. The Diplomat (Accessed April 20, 2018).
- The Economic Times. 2016. "Field training phase of foreign military exercise 'FORCE 18' conclude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field-training-phase-of-foreign-military-exercise-force-18-concludes/articleshow/51294989.cms>. (Accessed May 10, 2018).
- The Hindu. 2003. "Editorial: India and ASEAN." <https://www.thehindu.com/2003/10/09/stories/2003100901591000.htm>. (Accessed April 21, 2018).
- The Hindu. 2018. "ASEAN pushes India to conclude RCEP this year."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economy/policy/asean-pushes-india-to-conclude-rcep-this-year/article10046655.ece>. (Accessed April 23, 2018).
- The Telegraph Online Edition. 2018. "Kaladan Delay Blame on Ministry." <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states/north-east/kaladan-delay-blame-on-ministry/cid/1446488>. (Accessed April 25, 2018)..
- Tremblay, Reeta C., and Kapur Ashok. 2018. *Modi'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Ullekh N.P. 2017. *The Untold Vajpayee: Politician and Paradox*. (Kindle Edition)  
New Delhi: 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聯絡作者：劉奇峯

聯絡地址：401 Phoenix Complex, Bund Garden Road, Pune,  
Maharashtra, 411001, India

電子信箱：roger.cf.liu@gmail.com

收稿日期：2018/05/28

審稿通過：2018/10/03

責任編輯：高士元、鄧峻丞、宋淳暄、何育墉